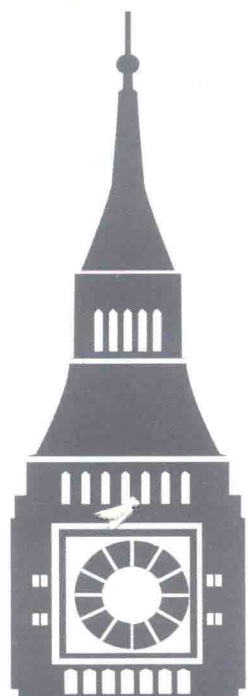


地球边缘的英伦三岛
如何成为人类有史以来不可小觑的“日不落帝国”

英国史

〔英〕屈勒味林 著 钱端升 译

A HISTORY
OF
ENGLAND



红旗出版社

英国史_下

〔英〕屈勒味林 著 钱端升 译

A HISTORY
OF
ENGLAND

红旗出版社

■
第四卷

A
HISTORY
OF
ENGLAND



国会的自由及海外膨胀

/

斯图亚特时期

概 说

政治上的特异进步 单就英吉利人民的人生观及习惯而论，推铎尔时期所引起的变动也许要比后继的斯图亚特时期所引起者为多、为大，但于政治方面，则在后期中的发展尤富异彩。使推铎尔英人不变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海洋事业，其发展固甚重要，然都为世界的运动，而非英吉利一国的运动，不像英人在斯图亚特时获得的种种政治上的进步则纯为英吉利所独有，既无外人的参加，又无别国的前例可供摹式。当专制君权，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方在大陆诸国大得其势，而个人屈服于国家之下，无可仰伸之时，英人则在从事于国会政府，地方行政，言论及身体自由之取得。当法兰西、亚拉刚及卡斯提尔的等级会议，连他们中古的职权也将无从行使之时，当德意志的政治生活因帝国数百小邦的割据分裂而枯萎待毙之时，英之众议院则因得乡绅的领导及受商人和通常法法家的联盟，而能努力于新国家的统治权的攫获。它之获得此权，由于两道：一为发达院中委员之制以充实内部的力量；二为和国王争执而打倒其权力。争执的主要原因本为宗教的，但其主要结果却为政治的。

英吉利自由本基于岛国的特性，故欲有充分的发展，必须先有相当时期的隔离，在此时期内能不被欧洲的势力所危害或波及。依利萨伯及掘类克的功绩，使这样的—一个隔离有实现的可能。欧洲当时的情形，尤其是30年之战，亦能助成英人的志愿；英人藉了海军的遮隔，可丝毫没有—被侵或被邻国干涉之虞，因得一心一意的解决本身的许多问题。

自由及国力 英吉利之重入欧洲的战场，盖已在解决国内问题之后。宪法的演化于1688—1689年的解决告—一满意的段落后，威廉三世及马尔巴罗才统率以宗教及政治自由为基础，而以国会为主力团体的新英吉利，以和举世所崇拜的法兰西雄主（Grand Monarch of France）路易十四所统率的，且充满“朕即是国”一类的专制思想，而又声威显赫，称霸大陆的法兰西，决一雌雄。那一次比武的结果—一方使

欧洲逃出了法兰西的罗网，一方又使英吉利的舰队初次成为全球海洋的无敌主翁。古时有“战审”^[1]（ordeal by battle）以决曲直之法，英和路易之战直可视为战审，而自由的群社及专制的国家将于以一较其上下。

比武的结果使向持和英制绝对相反之权力论的世界大为震惊，且骤然觉悟。世人向以专制为效能的秘密，而自由则仅为小邦如瑞士各州及荷兰七省等一类纤小群社所可享受的奢侈品，而况即以荷兰而论，它经了一度的光荣以后，已将有经不起法王方张的权力而有萎靡之势。所以国会英吉利的战胜专制法兰西实是一等重要的事实；18世纪自孟德斯鸠而后在国外盛行而以反对教国专制为目标的知识运动，实以这事实为首要的起因。不列颠的海军及马尔巴罗的拉和格（La Hogue）及布林亨（Blenheim）之战，使洛克（Locke）及其他英吉利哲学家得在大陆上享受英吉利哲学家鲜能根据自身的价值而享着的崇拜。英吉利的制度亦得首次做全世界的典型，虽则它们（制度）仍带些奥秘之气而不能为世人所通盘了解。

国王国会的均势及国力 不列颠在威廉及安时的成功尤其能使人惊奇，因为在1688年的革命以前，国会及国王间的争雄不特没有增加效能，而且尝使英国在欧洲国际的地位低落。初在詹姆斯及查理一世之时，继又在查理及詹姆斯二世之时，国会及国王间的平衡使英国绝对无影响国外政治的可能。

惟一的例外是清教共和国（Puritan Commonwealth）时的几年，然例外适足以证明定律的可靠。在那时候，国会党——至少可说是圆头党——大权在握，惟我独雄，立法及行政合而为一；所以在格伦威尔独人政治的以前几年及当今几年中，共和国的政府得享斯图亚特诸王所从不能享的赋税及海陆军备大权。在那时候，英吉利的意见可以得外国的尊重，而且也为外国所畏惧。但圆头党之集中一切大权于一身，实基于强力而不基于协调；以力服人者非心服，故只为暂时的现象而不能持久。

英国于1666年又恢复了国会及国王间，立法及行政机关间的均势。克拉稜敦（Clarendon）以均势为我们混合宪法的至境，故引为快事。但财政上的亏绌及不一致的朝议，亦随这完美的均势以俱来，驯至军备废弛，政策无定，仇敌当我做笑柄，友好见我而忧心。查理二世朝的种种祸根伏于此不幸的均势者，比伏于他自己的暴戾或疏忽者更深。世上没有一个国家能长为半国会半君主的国家，而又可以不受因缺乏实力而生的种种恶果之累者。

革命解决 一举而使英吉利兼获自由及效能两美者为1688年打破均势，归权国会的革命。此次国会之重握大权，乃由于辉格及托立两党的协调，而不像40年前

完全凭一党的武力来取得，故局面可以持久。至于两党之所以能有协调，则由于詹姆斯二世的无状。^[2]

自此而后，行政及立法机关间，国王及国会间，一般的大政复能如推铎尔时之有一致；不过倡随之势则今昔不同，在昔国王倡而国会随，今则国会倡而国王随而已。只有在两者的协调之下，政府才能整理国家的赋税及信用而使之近代化，才能维持一小小的常备军和一大大的舰队，才能发展并完善大帝国所必需的组织，而不虞有猜忌——曾经破坏斯屈拉福德（Strafford）及克伦威尔之种种相类努力的猜忌——发生。只有在两者的协调之下，政府才能使苏格兰人自愿的合并他们的国会于韦斯敏斯忒，有如克伦威尔曾以武力强迫他们采择的办法。同时，酿成过去数代中发生种种党争及流血的强迫国教政策（即强迫全体英人尽奉国教的政策），终亦为 1689 年的《容忍法》所视为不可实行而永远放弃。宗教和平及宽阔主义（latitudinarianism）的新时代很能增厚不列颠的商业、军事及殖民权力，而法兰西的则未免相形见绌。法兰西因缺乏容忍之故，竟把它人民中最长于工业的呼格诺徒，逼出国境而转为英吉利，荷兰及普鲁士方兴的制造业之助力。

大不列颠 在斯图亚特时期中我们更突破英吉利历史的范围，而进入最广义的不列颠历史之较大的空间。近代英吉利和苏格兰间及和爱尔兰间的关系，在论及依利萨伯时已经叙过。这种关系在斯图亚特时更因连列的几件大事而深印于子孙后代的脑海中。经许多的变迁以后，我们终于威廉三世及安之世永定了英吉利和苏格兰间的关系，且我们至今犹视为满意的解决。我们和爱尔兰间的关系，固为日后种种不幸之所由起，然不幸所由起的方向实亦定于那时。

美洲殖民 在同一的斯图亚特时期中英吉利复于北美建立繁殖的自治群社。英人开始向地球的另一面居住，但他们仍在英吉利的旗帜及英吉利的自由制度之下。在 17 世纪告终以前，他们已知改善在纽约及别地的此种制度，所以荷兰人及别的外人能居住于英旗之下而不感不便。当此之时我们已可看出一自由帝国，一包括种种种族及宗教的共和国之在胚胎；日后美洲合众国及不列颠帝国所异途同归以实践的也就不过是这个自由大邦的理想。在 17 世纪之末，欧洲别的国家的殖民地则另有发展的途径。法兰西的加拿大及西班牙的美洲既无政治的自由，也无宗教的自由；荷兰在非的殖民地则没有政治的自由，在美的也不甚大。英吉利则为首先树立自由的旗帜于海外者。

殖民的原动力 容忍各式宗教在英吉利国内。虽为 1689 年以前所未闻；但在海

外则为整个斯图亚特时期殖民政策的一部，国王或对敌的国会俱能体会容忍的精神。不论盎格力干，清教或公教教徒，如果不满意于在祖国的遭遇，俱可得政府的赞助而移往美洲；在此他们虽仍居英旗之下，但可随己意而祷告。在国内视为捣乱多事之徒，去美洲便可发扬英吉利的国力及光荣。这个比较自由的原则，为英吉利竞争殖民霸权时之一大胜着。

斯图亚特时期政府奖励殖民——纵为政敌所主持的殖民——的又一理由为国内英吉利政策工商业性之增加。国内政策之工商业性愈重，则殖民地愈欢迎。在国会当国之世，商业益为对内、对外政策中的首要考虑，而马萨诸塞特、纽约、维基尼阿及西印度群岛则被视为英吉利制造品的重要市场。

地方自由的牢固 1688年的革命虽为众议院得了最高的权力，但仍任他为“朽腐城市”（“rotten boroughs”）之制所拖累而不加纠正，故历时愈久，则他愈不能代表全国。随人口的变动来重新分派国会的议席固尝为克伦威尔主张，然终随克伦威尔而受长时期的埋没。因此，国会及国会所控制的政府愈久而愈能和能操纵“朽腐城市”的地主阶级混而为一。如果圆头党能获全国其余各部的赞助，则英吉利国家也许早可让一部分的平民势力加入主政。但自1660年而后，平民政治的精神竟如死去，直到下一世纪的工业革命给他以一种新生命后始再有所闻。半因这个理由，大西洋彼岸生气勃勃的平民政治竟日积月累地和国内的华族（aristocratic）国会失了衔接；两者间的区别更因新英格兰及旧英吉利主要宗教仪式的不同而加甚。

查理、清教共和国及末了詹姆斯二世的相继覆灭，俱为政府无法镇压乡绅阶级及特许会社（指城市）的表示，因此之故，国家对于地方政府及四乡的权力亦比依利萨伯时为狭小。塞西尔及窝尔星干对于治安法官的经济及其他作为所施的一种监督在斯图亚特时日趋放弛，而在早期汉诺威时则更显然的无存。国会之攻击国王自始本伏于地方自由和中央集权之争，故不啻即乡绅之反叛朝廷及枢密院。在这个竞争之中自由农民及市民尝助乡绅，尤其是乡绅中反对国王最力的一部分。国会的胜利固足以使英吉利比前更能一致地有力地对外，但就内政而言，则中央的权力自后不能不更服从地方的意志。因为清教革命失败之故，自1660年而后，乡绅的意志，即为地方的意志。

反对斯图亚特王室最后政治胜利固属于辉格党人——即乡绅中于国家大计能和伦敦及商人群社同盟一致的一部分——然社会上的权力则仍在治安法官及全部分的乡绅手中，而乡绅的大体固托立多于辉格。

社会上的专制 君主的政治及宗教上的专制权总算受了有效的约束。从此而后，国教教社不敢再求和全民族同一范围。国会胜了国王，通常法学家胜了特权法院。故个人的言论及身体自由也得受国会及通常法法家的保护。从政府方面看起来，人民尽可从心所欲而发言，其自由为欧洲别国所不能及，也为英国前此所未之见。废除社会上的专制则为较难之事。但在工业革命以前，世人并没有怎样感觉到社会解放及破除乡绅势力的必要。在乔治一世、二世时，英人以人类的自由为他们已经完全阐明的一种科学。这个观念，言之无论如何成理，或大陆各国无论如何的尚处于帝王，僧侣及贵族的统治宰制之下，更无论英人自骄之心若何可以谅解，当然是错误的；然而自马拉逊及萨拉密斯（Marathon, Salamis）的胜利者以降，是否有一群人，其对于基于实际的人类自由之建树可与圆头党及骑士党，斯图亚特国会中的辉格党及托立党之功业等量齐观，尚是一个疑问。

注释：

[1] 见上第 129—130 页。

[2] 译者按，Whigs 及 Tories 固可译为自由党人及保守党人。但如此译法，则 Whigs 和 Liberals 间，Tories 和 Conservatives 间将无可分。此为历史书，似未便埋没历史上的变迁，故不得已而从音译。

第一章

詹姆斯一世及查理一世时的政治宗教

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苏格兰詹姆斯六世，1567）；查理一世，1625—1649。

尊王主义及专制政治 推铎尔政府的主要音调为尊王而非专制。内无常设军队可供驰驱调度，外无有给吏僚可代统治郡县的人君，决不能为专制之君，因为他绝无可以威迫臣民之力。拱卫王宫的武士之所以能监押载运谋叛贵族或被革大臣的驳船，由槐特和尔^[1]的阶沿以至于伦敦塔的叛贼门（Traitors' Gate）者，亦因伦敦工徒从不想中途拦劫之故。但拱卫军如何能威迫好多在农屋的橡桷上常满挂弓、刀、钩镰等武器的500万人民？

简而言之，推铎尔诸王的权力不是物质的而是玄秘超乎自然的。他们有时得力于臣民的爱，但他们老靠着臣民的忠及“自由敬畏”（“freeawe”）。在以摩尔·托玛斯爵士始而以莎士比亚终的一世纪内，“由主所推举出的代表”（指国君）固俨然王者的威严，而当他的面前，无论如何高的品级，无论如何富的天才，无论如何神的宗教，都得低首下心而莫敢自骄；如其逢君之怒而有牺牲的必要时，他们且须俯首就戮，而莫敢有怨怼之态。但在下一世纪则天才及宗教并不这样易与了。

英吉利的尊王主义为一姓的秘密，而尤为时代的精神。他深得亨利父子及依利萨伯的政治天才之力，然尤得力于过渡时期——由中古至近代——领袖的需要。因为全国需要有力的领袖，故尊王主义得应时而生。此所以当推铎尔的最后—君死后，无精无彩的詹姆斯一世想把尊王主义化为君权神圣世袭的政治定理时，在把主义的精华只有蒸发而无存。

推铎尔诸王能充分代表英吉利的精神及政策；但斯图亚特诸王一方既根据于高于英吉利法律习惯的来源以为更大权力的要求，一方复采用在大体上不能获得英吉

利社会中最重要部分的同意之对内、对外政策。众议院为自卫起见，也只有替他自己为种种在宪法上尚属创闻的要求，一如国王所要求的君权神圣世袭之亦为创闻。

众议院的领袖地位 国会及国王间的冲突，要是没有宗教的问题来混杂其间且激动一切，是否会至短兵相接，诚可发生疑问；我们须知宗教问题在那个宗教意味浓厚的时期是有力的原动力。但要是没有如科克及塞尔登（Coke, Selden）等一班伟大的宪法律师及如厄力奥特、罕普登及庇姆（Eliot, Hampden, Pym）一班伟大的国会党人（Parliamentarians）——新的一种职业——则替下议院争的种种创闻的权力决不会提出来，更不会成为事实。在詹姆斯及查理一世当朝时，英国尝产生有名的一类人物以出席于国会。他们博通旧日的典型而又笃信法律、习惯及成例；他们自以为，他们并告国人，他们仅在要求旧有的特权，且执行《大宪章》的精神；他们就连《大宪章》的文字也未超过逾越^[2]。历史学本尚在幼稚时期，他们的要求之缺乏历史根据自然难免；在事实上，他们尽是创新者，于无意中他们在摸向一种英吉利所未见，而举世所未闻的政体上去。他们不是投机冒险之徒，他们也不是但求自利者：他们之舍田园大厦而就国会本是害多益少之事；那时的国会只是引人入监的绝路，而非取得权力的大道。他们信抗议教，他们又为集英吉利文艺复兴的大成之绅士；抗议教的诚笃性格和绅士思想及礼貌上的文雅在他们而兼备。这两种性质到了国会党于长国会（Long Parliament）的第二次会中分裂时，始分道扬镳而成为对峙的圆头党及立宪保王党。

詹姆斯一世之为人 当苏格兰后玛利和达恩利间可悲婚姻的可笑子嗣，苏格兰王詹姆斯六世，继依利萨伯而为英吉利王詹姆斯一世，并由爱丁堡缓缓地与伦敦进发时，远近的英人争趋集于过路上以一瞻新君的天颜。凡因品极较高而得挤在米德兰诸城市的群众前之人，其所见者为一和易的、自负的、唠叨的，长于书本智识而拙于知人之明的国王。至于英吉利的国情国法。则他更毫无所知，所以在纽窝克（Newark）他竟会不加审讯而命把当场捕获的剪绺贼绞死。苏格兰他固熟知，且能有部分的了解，然他又如何可据所知于苏格兰者而为阐释南首王国的政治地图之用？

詹姆斯的继立 但他的新收臣民雅不想多所批评。四十余年以来他们常处于“女王天年之后我们将安所之”一问题的黑影之中，他们惴惴然不安之态，更因依利萨伯之厌恶讨论继承问题而加甚，而延长。她厌恶讨论这问题，她一见这问题即愠气，她不愿有公认的嗣君，因为她深恐于她未死之前他即可以分享臣仆的忠心。一半政

治的，一半撒娇的，她总不喜人家提起这问题。但塞西尔·罗伯（Robert Cecil 即威廉之子）曾和詹姆斯有过协商，而他之继位之方亦早经相当的讨论及预备，故依利萨伯死后，一切得以平稳地继续下去，而英吉利人民亦如顿释重负。观乎钦定《圣经》的序言中铺张失实的言辞，我们犹可见当时人民额手称庆的一斑。

詹姆斯自幼即代他的母亲统治苏格兰，但他并没有替她雪耻，或承继她的政策。他之来英，本以继续依利萨伯的局面为涵蓄着的条件；他当然不能了解这局面真正性质，但在他所能了解的范围以内，他却并没有违背条件。塞西尔·罗伯继续为他的首卿，且膺萨利斯布里（Salisbury）伯的荣封。倍根·法兰西斯为詹姆斯的又一大臣，虽然他（倍根）劝他在教社及国家内采用容忍的说论，他（国王）常充耳不闻。所变更的，为依利萨伯战舰的取消，而刺里之被禁。刺里昔为海军的重臣，今则被禁于塔中。每当散步高台，从雉堞间窥见泰晤士河的樯杆，或闻着海员工作时的歌声及杂声之时，抚今思昔之情又安能免？

英吉利苏格兰的合并 新君带来了一件只他能致送的礼物——和苏格兰的合并。两国的皇冕既戴在一人的头上后，悠久而且浪漫的边疆史亦告结束。边境流寇的洪荒地昔尝为流寇出入之地，但今则变为牧羊者的牧羊地；牲群可以至哲威倭特的山麓及可争地（Debateable Land）^[3] 的中心而不虞有丝毫的危险。但两国的国会，教社及法律仍没有合并，而苏格兰人且因麋集朝中以和英人争位之故，而为后者所不喜。要等到 18 世纪之时，帝国才开始得着合并所赋予的新力量。但斯图亚特时政治及宗教上的错乱及嗜杀，幸赖英吉利及苏格兰两国事务之得互相影响而差获补偿。

詹姆斯的苏格兰政策 苏格兰转因国王之不驻本国而就范起来，且空前的受制于王权。他的国王詹姆斯六世所在地虽离爱丁堡有 400 哩之遥，但他今为权力伟大的人君，从槐特和尔他可以震慑苏格兰贵族，同时并防止刻克（Kirk）之僭夺政权，凌驾国家。为达到后者的目的起见，他常煽动贵族对于小地绅及低级教士的嫉妒心，他常使前者对于后者之藉宗教组织以侵夺政权发生愤慨。这种挑拨政策常见成功，他更委派若干谦卑听命而俸给又微的主教以抵制民主的教侣会议及评议会（Synod）^[4]；前者之权愈增，则后者之权益减。他的办法固收防止僧侣专制而保护苏格兰宗教生活中的缓和派及自由派之效，但当时苏格兰人民惟一的自己表示自己之法亦被摧折于无形，惟他尚不至于连牧区中的长老组织也想破坏，他也不至于强迫苏格兰的会众采用英吉利的礼拜书。劳德（Laud）可为“苏格兰无宗教”的谬见所包蔽而身败名裂，但詹姆斯一世尚不至于让这样的一个谬见来蛊惑他。他知苏格兰有宗教，

而且正嫌其太有宗教，他惟一的志愿在把他收纳于相当的范围之中而不使他太跋扈。他之知苏格兰犹之他之不知英吉利，犹之他儿子查理之不知任何一国。

詹姆斯与英吉利 如果不知为不知，那倒也是知了，然詹姆斯不特永不知英吉利，且永不知他之不知。当他来到槐特和尔执政之时，他已早有定见，他在那里所受的谄谀，更坚他自以为是之心，而自信识见的参透。政治宁非他已经熟谙的科学？天子圣明，他岂不常在以天子之所知教诲他无知的臣民？既没有一人敢当面和他答辩，他自然以为他的见地足以驳倒群伦。而且在苏格兰时他从未得过类似英吉利众议院一类的经验。苏格兰的所谓国会实则仅一记录法院，他如何能了解领略同名的英吉利机关所占不同的地位？在苏格兰所有的反抗皆自男族的庄产上及教士的经台上发出，那么在众议院中终日讨论“特权”“成例”及“国家基本大法”，拒绝他不依他们的条件而征收赋税，且决定最重要的宗教及外交政策而强他遵从的一班乡绅固又何种样人？他尝枉顾地，自屈地，指出他们的昏愤，而欲他们觉醒；然他们既不听话，则他舍盛怒而发作外，更有何种别的办法？

詹姆斯与清教徒 斯图亚特王室和英吉利清教运动的关系决定于新朝的首先几个行动之一。盎格力干教社在此时尚为清教活动的主要用武地，换言之，清教主义尚想站在国教之内来图改良，而尚没有于国教之外另树旗帜之意；此所以几许国教的领袖僧侣会去罕普吞王宫会议（Hampton Court Conference）以恳求国王正式包容持清教主义的教徒于国教之内，而不仅为事实上的容忍。他们的态度极谦卑，他们和昔年卡特赖特或彭立之敢要求主教制度之推翻或《祈祷书》之大大修改者迥不相同。他们深知欲违反国王的意志而夺得教社为不可能之事，他们之所请求者仅为仪式上及牧区工作上若干为法律所许的变化，庶几他们可有固定的地位。

当时诚是解决清教问题的最好机会。国教依创立者的原意本是富有伸缩余地的一种制度；只消范围稍稍扩大，当时的宗教问题便可藉包容（Comprehension）为根据而得以解决。而且当时的犹为教外无教的教社，故教内有教更为事理上所应有。清教运动是时对于世俗社会，尤其对于国会，有最大的势力；不许它有任何合法的活动，在国教外同不许，在国教内也不许，便是播下内战的种子。但詹姆斯在罕普吞宫之所为，就是播下不祥种子。他之呼“如没有主教，便没有国王”固未尝超过他的权利，然那时哪有发生主教制存在的问题。他之继作“我将令他们完全遵从国教，违教者我将摧之折之而使之出境”之盛怒语。则更为不幸剧之开始，而使三世英人流血流泪，附带的又把主权自国王移至国会的内战终莫可避免。

詹姆斯之拒绝国教以外或国教以内之有容忍。并不由于他个人坚持高教社^[5]宗教的结果，他儿子查理才为此种宗教所感动。在教义上他仍为喀尔文派，但他于民主的及诚恳的一派宗教在苏格兰所见已太多，故深畏其在政治上所发生的连带关系。他在罕普吞宫中呼着：“苏格兰长老会之不能和君主协调，犹之上帝之不能和魔鬼协调……雅克、托姆、威尔、狄克^[6]都可开起会来，而任意纠弹朕及朕顾问官的行为。”此一场无结果的会议散后，300名清教僧侣竟被政府革斥而失了禄食，而大规模的“违教”（“Non—Conformity”）^[7]亦于此时开始。但在此后之84年内，不遵从国教的礼拜犹为非法的而且可以致罪受罚的礼拜。所以各党益不能不竭尽全力以争这教外无教的国教之把持。

詹姆斯与罗马公教徒 有好些人尽管自身为争斗的厉阶，而恒自以为和平的创造者，詹姆斯即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颇以能排难解纷为自得，实叫他所视为排解不啻是煽动，而人民间本有的斗争更甚于昔。他许以容忍待信罗马公教的臣民，然他对清教主义既采诛除的态度，则待公教的容忍终亦莫可维持。私下信奉公教者为数本众，但在向日尚为人所不知。自惩罚公教徒的诸法律稍弛于执行而后，世人始知其为数之众，而民众遂亦大为震惊。耶稣会徒的政策在推翻现有局面，并在以武力消灭英吉利的抗议主义，所以自当局及人民看起来，伊利萨伯朝诛除耶稣会徒的精神及手段自应沿用而不稍轻减；但自许多的罗马公教徒看起来，欲报复这样的诛除亦只有采用耶稣会徒的政策。这诚是一个恶劣的循环，而无可如何者。

火药计划 国王允许宽容之后，公教徒本有所希冀，所以惩罚不从国教者之重又实行，竟使耶稣会党中一部分的公教绅士愤怒万分，因而更有火药计划（Gunpowder Plot）之组织，其目的在一举而杀国王及国会的全体。在推铎尔的早期，世人尚以为去国王即可以使政府瘫痪，故作乱者只害国王；但今则作乱者觉得国会也有被杀的必要时。阴谋的物质方面都已布置妥帖，且由曾在西班牙尼德兰的驻军中做过军官者担任一切；但事发之前有一个较富恻隐之心者忽向政府告密，故计遂破获。“行为的恶毒固无足奇，然而这样一个毒谋之发生则诚足奇异”；然而罗马公教徒自推铎尔·玛利迄詹姆斯二世间所受道德上的打击盖无过于此者。自头脑简单的英人看起来，所有关于耶稣会徒教训的恶劣影响之预测皆一一应验，而抗议教徒所举行的福克斯盖（Guv Fawkes 即主谋者）节及11月5日节不但在教堂中有慎重的仪式，而在街道旁亦有平民化的仪节，即最恶神秘气的人亦能尽情参加。自此而后，反罗马的情感复一发而不可收，终斯图亚特混乱多变之世。它成为一常存的史因，有时

且为举足轻重的史因。

战备之不修 詹姆斯厌弃一切海陆战备。在他衰老将死的数年中他固尝任好动而有雄图的巴京汗 (Buckingham) 去经营一切,但他自己始终厌弃兵事,他为英吉利诸王中之最主和平者。他喜用他的笏及笔,且以为两者都胜过 10 万军。对于钢器他尤有看见不得的害怕;这也许是因为他诞生之日,适为武装暴徒突破他母亲的晚餐聚会,并当她之面杀死里切奥后^[8]3 月的那日。詹姆斯不但本身不好战争,且因是一个十六七世纪的苏格兰人之故,他对于海权的重要也毫无所知。他是斯图亚特王中惟一的完全忽略海军者。

英人和西班牙的美洲 因为忽略海军之故,他虽和西班牙媾和而不能尽收媾和的硕果。在结束依利萨伯之战的和约中,英国固为它的商人取得了和西班牙及其欧洲属地间公然贸易之权,且限止了西班牙在它的港埠中任意查考英商的权力。但条约中于英人和西班牙美洲的贸易,及和被葡萄牙所把持的亚非两洲的贸易则一语没有提及。依利萨伯时英吉利海员的要求 (claims),此坐视海军不振的政府实无法坚持,不特它自己不去坚持,它且不容人民自动去维护。政府对于私船武装劫掠之风转尽力加以禁止。

处这种情境之下,英人和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的私战虽仍继续下去。但得不着政府的暗助或嘉许。在亚美利加印度 (American Indies) 方面,一班所谓“熏烤海贼” (“buccaneers”) ^[9] 只消他们能窘西班牙而能维持英吉利的尊严,无论他们的行为如何非法,总可到处得到援助者及同情者,且更能于西印度群岛及北美大陆建立殖民地。但他们不特专掠西班牙人,在斯图亚特时的末期他们已由掘类克及刺里们的高尚传习降而为提次 (Teach) 及黑旗海盗的下流劫贼行为。同时,南美的贸易在法律上至少是门户不开放的,除了西班牙人以外,无人可以问津,虽则北美因掘类克的胜利,英人、法人及荷人在事实上是可以去居留的。

英人和葡萄牙的非洲及印度 在非洲及东印度的沿岸,当时犹臣服于西班牙王的葡萄牙人力想抵制詹姆斯一世的人民和土人通商;即和平恢复以后,葡人仍不许他们通商。东印度公司因令船只一律武装以应战,柏斯特及丹吞 (Thomas Best, Nicholas Downton) 两舰长复杀败葡萄牙人于近苏拉特 (Surat) 的海上。因此英人和亚洲土人间的贸易转可比和有兵守护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之沿岸居民间的贸易为繁盛而有规则。

于抵御东方的葡萄牙人时,英荷两国的商人为声气互通的盟好。但除此而外,

两抗议国的经商人民恒彼此仇视；葡萄牙人在东方海洋中之势力不振后，英荷商人间的仇视亦更甚。当詹姆斯及查理一世之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商人的富力比英公司商人的为大。当时荷兰适处最安全的时期，西班牙侵吞的危险已成过去，而法兰西欺压的危险尚属未来，故虽蕞尔小国，而富强惊人，科学艺术居世界之首，且为海上的主人翁。荷兰人成为人类的运货者；然他们的贸易愈盛，则英人愈形见绌，依利萨伯时英人所开发的俄罗斯贸易也被他们所夺去。他们更随处捕鱼，即本为英人捕鱼的地方，他们亦敢有喧宾夺主的行为。他们复驱逐锡兰岛及麻刺甲海中丁香群岛的葡萄牙人。在 1623 年他们复屠戮群岛的英人于安波衣拿（Amboyna）。詹姆斯竟无法可施，直到克伦威尔当国时英人始能强迫荷人赔偿一代以前的耻辱及损失。

英吉利东印度公司被逐于丁香群岛而后，改向印度大陆进行。在詹姆斯一世时，它已在苏拉特地方设立一个贸易场所，在查理一世时更于玛德拉斯（Madras）建立了圣乔治要塞（Fort St. George），而在孟买设立了其他的贸易场。不列颠之统治印度盖即起于这种微末的商市。唯这班东印度的商人自始即非“摇笔者”流；他们尝在本地君侯的庙堂中以外交手段来破坏葡萄牙人的垄断，又能在大海上用列炮来轰毁他们的船只。

詹姆斯之忽视海军 同时詹姆斯则将王家海军向争的利权逐一放弃。在英吉利领海中外国的船舰可不复向英旗致敬礼。来自北非巴巴利沿岸的海盗可自由在海峡中掠劫而不虞有任何的惩创。詹姆斯对于荷兰人及西班牙人虐待英人的抗议则被两国嗤之以鼻。为缓和西班牙大使的咆哮起见，詹姆斯复把刺里斩首。我们虽仍为航海的群社，但我们失海权国的地位者几有 30 年之久。

詹姆斯忽略海军之又一结果为商人及航海者之怨恨斯图亚特王朝；渡海人民浓厚的抗议情感更增加他们对于王室的恶感。依利萨伯在海上及对付西班牙的传习新君竟弃之不问，这当然足以使上列的人民愤慨万分。查理一世固尝拨非法的船税以重建他父亲所忽略的海军，然仍不能挽回人民已失之感情或改善人民已有的恶感。在紧急之时，查理所造之船竟会造反而加入乱党，而英吉利的诸海港在第一次的内战时竟瞻伦敦及众院的马首而随同作乱。刺里的英灵竟紧随斯图亚特王室而逼之登断头台。^[10]

卅年之战 詹姆斯和平政策之无力因卅年之战（The Thirty Years' War）的爆发而益显。因为他忽视战舰之故，他的和平外交虽用意甚佳而丝毫不能生效。他既任英吉利的军舰颓废，他既无实力以阻止西班牙军队之通过海峡以至尼德兰，他又乌能强西班牙或奥地利、法兰西或葡萄牙以听从他的调停？

公教大反动在腓力二世之时尝一度被挫于英吉利及荷兰。现又爆发的卅年之战在根源上固可视为大反动之重又前进，不过今则奥大利为新的主角，而西班牙反退居于协赞的地位。波希米及莱因巴拉丁（Rhenish Palatinate）都被蹂躏，前者被奥大利的兵士，后者则被取道尼德兰而来的西班牙兵士。两地的抗议教也都因诛除而消灭。这两地的君主非别人而即是詹姆斯一世的子婿，今则竟被逐出境。他的妻子依利萨伯及他们的婴孩鲁柏特及毛里士两亲王（Prince Rupert, Prince Maurice）所以从幼即开始他们长期流落的生活，不过母子的高才厚德却始终不因流落而有所毁伤。^[11]詹姆斯为求他们的复辟起见，竟不惜颜以求好于敌人；先则听命于西班牙大使根多马（Gondomar）而任他指示英吉利应采的政策，继又提议和亲，提议将他儿子查理和西班牙公主结婚。但詹姆斯尽管丢尽英国之脸，而依利萨伯等仍不得复位。

查理的婚姻问题 西班牙的和亲势必产生西班牙的后裔及公教的国王来危害依利萨伯女王的基业，此为英吉利人民所熟知的。但老年的詹姆斯及幼年的查理当时正深中韦立哀兹（George Villiers）的迷惑，唯他的言是听而计是从，而据他好动易变的幻想，则唯英西的和亲方可使欧洲重获和平。他们封他为巴京汗公，他们赞成他的提议。然而查理及他的幸臣虽亲至马德里，而结婚计划终成画饼，他们且须冒险逃出西班牙的京城以逃命。不得于西班牙王室后。查理转而和笃信罗马教法公主盎立厄塔马立亚（Henrietta Maria）成婚。这个婚姻的危性仅次于和西班牙缔婚的拟议；盎立厄塔马立亚卒为英吉利许多纷乱的祸根。而尤其是斯图亚特王室的灾星。^[12]

巴京汗之黷武 詹姆斯一世殁于1625年，但巴京汗的势力则一仍旧贯；父死子继，英吉利的形势亦不变。和亲西班牙计划的笑话一若尚未足以餍巴京汗之欲，故他又继之以军事上的胡闹。他以抗议教的英雄自命，故屡次派遣军队去欧洲作战。然他绝未作若何的谋划，而海陆军亦绝无预备。结果是次次丧师辱国，贻笑外邦。这些绝无意识的远征军中，有几次是为帮助刺罗舍尔的呼格诺徒而派出的。他以为大教臣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是随便可以攻击的。实则他如果攻击莱因以东法兰西的公教敌人所主持的公教反动，则抗议教徒转易伸首，而黎塞留欺压呼格诺徒的行为转可敛迹。他之徒然开罪于黎塞留又有何用？至于进袭西班牙的远征军亦一样的失败无成。

权利请愿书 接二连三的轻举妄动和不断的败绩覆没既降低王室的地位，复激起众议院的反抗。战事起后，国王尝不得国会的同意而自行课税，此外更有军队随处驻扎、任意幽禁人民及向平民执行军法之举。凡此种种，国会在有名的《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中皆目为违法者。查理为急需国会通过五种补助税起见，

不得不承认国会的要求。但《权利请愿书》和《大宪章》一样，两者都是力争其中所要求的权利的起首，而不是争得权利的结束。

众院当时虽尚无指令国王如何对外的权力，但已有阻碍战事进行的力量。它本有的课税的权力，它当然牢守而不肯放松。但军队它是无法管束的，故它不能不多方疑惧。如果国王可有任意征税之权，有如法兰西及西班牙国王之所享。则对外的战事及外交也许可以由旧日的不振一变而有成功的可能；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内的国会岂不将就此完了？

在依利萨伯朝时众院中尚有一班老练的枢密员做领袖，所以众院常能为政府之助，但今则枢密员不复在众院中领袖群伦，而组成众院的绅士竟渐渐立于反抗政府的地位。他们因接近田土之故，所知本国的利害自较切于朝臣，然他们对于国外之事也一无所知，至于如何而可以援助国外的抗议教势力，则更不知所措而常会岔事。执行的国王及课税的国会既处于两不相能的地位，而两者又都昧于外交之事，军队既没有，而王家海军又大不如前之盛；英吉利当卅年之战时之无足轻重亦固其宜。

国会处于反对地位 当巴京汗尚在布置援救刺罗塞尔的远征军时，他被一个清教狂徒所谋杀，一班民众也不辨曲直而有得色。巴京汗之流血益使查理对于人民无好感；但他也逆知战事之不能有成，因即放弃作战计划，而思以紧缩的政策来治理英国。国会是他所痛恨的，为求无须求助于国会起见，他转愿减省国用。1629年他和众院的互哄，益足以坚他无需国会之心。是年众院议员竟有强制议长坐于议长席中，不许作声，而通过痛斥“教皇教派及阿民尼阿斯派（Arminianism）”及非法的吨税镑税（是时人民的心目中两者盖有相连的关系）的有名决议之举；自是而后，国会不再召集者历11年之久。

厄里奥特 查理复推翻前代的成规，而蔑视国会议员的特权。在依利萨伯时议员在国会中的言论或行为在外向不负任何责任，但查理则因厄里奥特·约翰爵士及其友人发楞泰因及斯屈洛达（Valentine, Strode）在院中的行动，而把他们拘禁于伦敦塔中。厄里奥特始终认拘禁为违法，始终不肯屈服；他前所斥为非法者仍咬定为非法，不肯乞怜以邀释放；他卒殉英吉利法律及自由而死于狱中。他的友人亦历11年而不获自由。查理对于厄里奥特极端刻薄，即他尸身亦不许尸属携归卜葬于康华尔的故乡。查理也许欲为旧友巴京汗出一口恶气，故对于曾攻击他幸臣的厄里奥特特别刻薄。但此仅为最宽原的解释而已。无论如何解释，无论在人性上是否可原，他的对于臣民的残酷实是危险万状的一件事。他在此后的11年中将为独裁的君主，